

【语言文学艺术研究】

# 汉代政论文的故事化取向及其成因

韩志远

(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, 浙江 金华 321004)

**摘要:**汉代政论文多用周汉故事,有学者称之为“故事化取向”。故事素材源自先秦典籍和秦汉史传。其特点表现为,一是故事篇幅精简凝练,将故事原文或本事作剪裁化用,但却保留下故事的内涵;二是多个故事连类而及,抓住这些故事的相同内涵,并以相近或相同的形式排比罗列。政论文使用故事达到了两个效果,一方面为文章论证主题提供强有力的论据支撑;另一方面巧妙地传达了难以言传的多重情感和政治内涵。政论文多用故事,与汉代帝王议事制度、学者风气等因素均有关联。

**关键词:**汉代;政论文;故事;剪裁;说理;博学

**中图分类号:** I 207.6      **文献标识码:** A      **DOI:**10.13486/j.cnki.1673-2618.2022.05.013

汉代政论文中出现了大量周汉故事,阮忠将之称为“两汉说理散文的故事化取向”。<sup>[1]210</sup>这种故事化取向,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的说理传统,汲取了先秦史传散文的故事素材。然而,不同于先秦散文的是,汉代政论文浓缩了故事篇幅,将内蕴相同的故事罗列排比、连类而及,故事素材还扩展出了“汉家故事”一类,如文帝节俭、武帝征伐、石渠阁、白虎观、江京秉权、王圣乱政、梁冀废立等。故事中的人物事迹,成为汉人阐述政见、表情达意的载体,有着鲜明的汉人特色。汉代政论文的故事化取向从成因来看,受到政治实践、学术风气等影响。

## 一、汉代政论文故事化的形式特点

说理散文摘取故事素材佐证说理,在先秦诸子那里就已有运用,太史公说:“及如荀卿、孟子、公孙固、韩非之徒,各往往捃摭《春秋》之文以著书,不可胜纪”<sup>[2]卷十四510</sup>。正是说明诸子以诸侯之事佐证己见、著书立说的现象。像《韩非子》从

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等史传中提取素材、总结历史经验,已标志着以事言理论说方式的成熟。汉代政论文使用故事素材,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,表现出不同于先秦散文的新特点。

### (一)浓缩精简,化用故事

两汉政论文中故事素材主要取自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三传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汉记》等著作,这些作品除《诗经》以外,大部分具有史书传记的性质,虽然记叙历史事件有繁有简,但是都有较长的篇幅。汉人在运用这些较长篇幅的故事材料时,并不是原样照搬,而是作了剪裁,化用了人物故事。

一是表现在对“《春秋》三传”、《尚书》等经典故事的删减。董仲舒倡言: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谊也。”<sup>[3]237</sup>赋予了以《春秋》为代表的五经政治教科书的地位,《春秋》等经典成为汉人表达政见所常引用的材料。汉人在使用关于《春秋》等经典的故事材料时,往往删减情节性的部分,缩短篇幅,但关键的经义部分却恰

收稿日期:2022-04-14

作者简介:韩志远(1997—),男,山东惠民人,在读硕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。

E-mail:1772023875@qq.com

如其分地保留下来了。宣帝五凤年间,匈奴内乱,汉庭想要借机一举歼灭匈奴,萧望之上《对诏问因乱灭匈奴议》,以“《春秋》晋士匄帅师侵齐,闻齐侯卒,引师而还,君子大其不伐丧,以为恩足以服孝子,谊足以动诸侯”<sup>[3]337</sup>,反对此时攻伐匈奴。士匄之事,出自《春秋公羊传》襄公十九年,原文为“《春秋》晋士匄帅师侵齐,至谷,闻齐侯卒,乃还。还者何?善辞也。何善耳?大其不伐丧也。此受命乎君而伐齐,则何大乎其不伐丧?大夫以君命出,进退在大夫也”<sup>[4]卷第二62</sup>。萧望之以转述的口吻,缩减了原文的篇幅。不过,虽然篇幅缩减,但是《公羊传》所阐释的“大其不伐丧”的经义却恰当地表达出来了。还有像杨震《上疏请处乳母王圣》言:“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,恣骄弟之情,几至危国,然后加讨,《春秋》贬之,以为失教”<sup>[5]519</sup>,剪裁了《春秋左氏传》“郑伯克段于鄆”<sup>[6]卷第二62</sup>之事。汉人剪裁《春秋》故事,缩减变化的只是情节性的部分,真正传达经义的故事内核却被完整地保留传达出来,表现了汉代儒臣在政治实践中对经文、经义的灵活处理与应用。

二是表现在简化使用战国以来流传的故事上。贾谊《陈政事疏》便简化使用了《战国策·赵策》中豫让刺杀赵襄子一事,将原来《赵策》中豫让多次刺杀赵襄子的描写以“五起而不中”概括,保留了豫让“国土遇我,国土报之”的名言。这样虽然整体缩减了故事的篇幅,但是却保留了故事所传达的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内涵。周举《对策问灾异》用《晏子春秋·谏上》“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子谏”一节,将原文记载的齐国大旱,齐景公召问群臣,决定祭祀灵山、河伯的情节,简化为“昔齐有大旱,景公欲祀河伯”,而故事最富思辨性的晏子言论却并未大幅删改,近乎完整地表达出来了。另外,汉人简短概括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,而读者受众却已知其所表达的深意。如王嘉《上疏请养材》将太史公浓墨重彩描绘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一事,精简为“魏公子顾朋友之要,触冒强秦之锋”<sup>[3]486</sup>。信陵君之事已广为流传,作者只要简单提及几个故事要素,读者便可意会。这正是刘勰说的:“故事得其要,虽小成绩,譬寸辖制轮,尺枢运关也。”<sup>[7]616</sup>汉人政论简化故事,而能够准确地把握故事传达的哲理内核,并恰如其分地应用在行文中。

## (二)罗列排比,连类而及

随着故事情节的精简和篇幅的缩减,汉人政论文中增加了故事的数量。同一篇章中使用多个故事,在形式上对偶、排比,有着明显的骈体倾向;从内容上则是连类而及,有着共同的主题内涵。如谷永《上疏讼陈汤》罗列故事道:“臣闻楚有子玉、得臣,文公为之仄席而坐;赵有廉颇、马服,强秦不敢窥兵井陘;近汉有郅都、魏尚,匈奴不敢南向沙幕。”<sup>[3]469</sup>楚与赵、近汉相对,子玉、得臣与廉颇、马服及郅都、魏尚相对,文公与强秦、匈奴相对,三个故事共同表达出重用贤臣就能威震敌国的主题,给读者造成冲击震撼的效果,在义理上形成理所当然的夺人气势。

政论文在表达相同或相近主题时,形成了一些人物事迹的固定搭配。如在阐述强臣专权问题时,常以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、季氏颛鲁等故事排比、连类,张敞《为霍氏上封事》就是这样,其奏议言“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,大夫赵衰有功于晋,大夫田完有功于齐,皆畴其官邑,延及子孙,终后田氏篡齐,赵氏分晋,季氏颛鲁”<sup>[3]305</sup>,以此为例论述了权臣震主的危害。郑弘《疾笃上疏》中:“昔田氏篡齐,六卿分晋。汉事不远,炳然可见。”<sup>[5]296</sup>也是如此。此外,汉人政论文中谈及阴阳灾异多以成王出郊而反风、鲁僖公善政应对旱灾、宋景公有三善言使荧惑之星移舍等故事劝诫人君;议论经学则标榜宣帝石渠阁、明帝白虎观集会;推荐贤才则以文帝用魏尚、武帝用韩安国、宣帝用张敞为榜样;征伐四夷则以宣王伐獫狁、武帝伐匈奴为借鉴,等等。政论文中故事相对固定的搭配,一方面说明政论文中讨论的这类政治问题在汉代反复出现,汉人归纳历史经验,总结出了应对方式;另一方面,则表现出汉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,应对举措的固定性,有着思维定式的倾向。

此外,在有思维定式倾向之余又不乏灵活与创新。这表现在汉人使用某些主题的故事时,不仅使用老生常谈的先秦故事,也会使用刚发生的近代事件素材,展现出与时俱进的一面。以教授皇子这一主题为例,文帝时,贾谊《陈政事疏》中“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,召公为太保,周公为太傅,太公为太师”<sup>[3]159</sup>,仅以成王故事为例。光武帝建武十九年(43),班彪《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

国官属》奏言：“昔成王之为孺子，出则周公、召公、太史佚，入则太颠、闳夭、南宫括、散宜生，左右前后……汉兴，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，贾谊教梁王以《诗》《书》。及至中宗，亦令刘向、王褒、萧望之、周堪之徒，以文章儒学，保训东宫以下，莫不崇简其人，就成德器。”<sup>[5]230</sup>班彪不仅用久远的成王故事说明道理，而且还以晁错教授景帝，贾谊教授梁怀王，及刘向、王褒等人“保训东宫”之事资以证明。汉和帝即位，窦宪《上皇太后疏请以桓郁刘方入侍讲》除了使用成王的例子外，不但用了西汉韦贤、蔡义、夏侯胜等人入授昭帝的故事，还采录了发生没多久的章帝时张酺、魏应、召训等人入禁中侍讲之事<sup>[5]53</sup>。就论证说理来看，使用本朝发生不久的史实故事，远比使用典籍记载的传说故事更具可信性和说服力。班彪、窦宪等人能够有意识地采用新故事，也正是为了使论据更加充实、可信。可见，汉人使用故事并不刻板、迂腐、格式化，他们不仅能“采故事于前代”，也能“观通变于当今”。<sup>[7]438</sup>

## 二、汉代政论文故事的艺术效果

汉人政论文中频繁使用故事材料，产生了两重效果：一是一连串的事例排列，强化了说理效果；二是以故事譬喻，巧妙地传达感情，造成感同身受的效果。

### （一）据事类义，佐证说理

政论文中，广泛使用故事材料的突出作用，首先表现为辅助议论说理，为作者阐述政见提供论据支撑，也就是墨子“三表”中的“有本之者”<sup>[8]400</sup>。政论文使用故事，或者“明理引乎成辞”，以五经、圣人言辞为法度；或者“征义举乎人事”<sup>[7]614</sup>，以相关人事阐明义理。总之，是“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”<sup>[8]400</sup>，从而“据事以类义，援古以证今”<sup>[7]614</sup>。如光武帝即位不久，彭宠在渔阳造反，光武帝想要御驾亲征。伏湛以文王伐崇之事劝谏，其《上疏谏征彭宠言》认为文王征伐崇城慎之又慎，光武帝也当如此<sup>[5]106</sup>。光武帝最终没有亲自出征。古代圣王事迹具有公认的权威，伏湛文中征引文王之事作论据支持，其观点也就有了理所当然的可行性。

政论文中使用故事还有打比方的性质。《礼记·学记》中，孔颖达为“比物丑类”注疏曰：“古

之学者，比方其事以丑类，谓以同类之事相比方，则学易成。”<sup>[9]1247</sup>认为打比方有助于学习理解。同样，打比方也适用于说理议论。陈望道认为，打比方能够将本来不便说或不容易说明白的本意说得明白亲切。<sup>[10]98</sup>政论文使用故事就是“举异事之同类者”<sup>[11]90</sup>相比方。如安帝永宁元年，太子刘保受王圣、江京等人诬陷将被废除，张皓奏《上疏谏废皇太子》劝谏安帝<sup>[5]500</sup>以武帝废戾太子之事类比安帝欲废太子刘保，劝谏安帝不要像当初武帝一样做出无法挽回的错误决断。

另外，汉人还往往在政论文中排列出一系列故事之后，阐明其中的意蕴道理，一语破的。数个故事排比、连类，具有了归纳推理的性质。如刘向《使外亲上变事》一文，连用季布、兒宽、董仲舒、夏侯胜四人有罪而被君主赦免，最后均成名臣的故事。<sup>[3]368</sup>列举故事后，刘向归纳出“有过之臣，无负国家，有益天下”的论点，反对“有过之臣不宜复用”的言论。可见，汉代政论文“未尝离事而言理”<sup>[12]60</sup>。排比罗列一系列史实故事，则不仅让说理明白、透彻，具有说服力，而且还产生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逼人气势，有助于作者说服人主，阐明政见。用故事类比时下政治，体现了汉人对事物本质的清醒认识，对事件关系的深刻把握，表现了汉代政论文人在纷纭复杂的政治中保持的高度理性。

### （二）旁喻博引，表达感情

政论文中广泛使用故事材料的第二个作用是，以旁喻博引的方式，传达容易意会而难以言传的复杂情感，通过烘托强调，产生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。

政论文是一种实用性较强的文章。虽然抒情不是政论文的主要功用，但是作者的感情却不可避免地流露于字里行间，常见的有对国家的热爱、对奸佞的痛恨、对难民的怜悯、对灾异的敬畏等等。还有一些政论文主题本身便是表达感情的，如以自讼、陈情、谢恩等为题的篇章。政论文传达感情，也往往是用故事使抽象的感情具体化，产生动人的力量。如中山靖王刘胜《闻乐对》开篇说：“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歎，思者不可为叹息。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，荆轲为之低而不食；雍门子壹微吟，孟尝君为之于邑。今臣心结日久，每闻幼眇之声，不知涕泣之横集也。”<sup>[3]116</sup>

以荆轲听高渐离击筑、孟尝君听雍门子微吟比喻自己闻乐而悲,引起武帝的联想,创造悲凉的意境,渲染悲伤的气氛。在大段论述之后,阐明自己悲伤的真正原因是“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,鸿毛之重,群居党议,朋友相为,使夫宗室摈却,骨肉冰释。斯伯奇所以流离,比干所以横分也”<sup>[3]117</sup>。是自己作为宗室皇亲为一般官员所打压排挤,受到皇帝的猜忌和怀疑。刘胜用后母离间伯奇与父亲尹吉甫之事、王叔比干被侄子商纣剖心之事,来传达藩王因廷臣谗言而被皇帝疏远以致骨肉分离的悲伤。刘胜的情感表达感动了武帝,从此之后“上乃厚诸侯之礼,省有司所奏诸侯事,加亲亲之恩焉”<sup>[13]2425</sup>。再如邹阳《狱中上书自明》几乎全篇用事,“信而见疑”的情感亦是用秦昭襄王怀疑卫先生、燕太子丹怀疑荆轲之事传达。班超年老,《上书求代》则以姜太公封齐而葬周,表达身在西域,却有“狐死首丘”“代马依风”的思乡之情。可见,政论文不只有客观沉着的陈事说理,也有诚挚动人的感情抒发。而且,以情动人也是汉人向君主进言的一种有效方式,相较于冷静沉着的说理议论,饱含情感的倾诉更动人心弦。使用故事将难以言表的感情巧妙地意会出来,收到意想不到的进谏效果。

### 三、汉代政论文故事化取向的成因

从散文发展的角度看,两汉政论文使用故事继承了先秦说理散文的用事传统。然而,汉人无论是庙堂诏令奏议之文,还是草野刍尧狂夫之论均频繁使用故事,以致成为有汉一代政论风气,原因并不止于继承先秦传统这么简单。汉兴之后,汉家守成的现实政治需求、博学知识主义风气兴起、历史故事材料的积累等成为政论文广泛使用故事的深层原因。

#### (一) 征引故事,折衷是非

汉初君臣“布衣将相之局”奋起于陇亩,治国理政不像东周各国贵族一样有先王成法可循,不得已已在经典故实中“引古今处便宜”<sup>[13]3222</sup>,如赵翼所说“汉初法制未备,每有大事,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”<sup>[14]43</sup>。依经断事体现在政论文中就是征引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等典籍故事,以故事阐明经义,以经义故实折衷是非。像董仲舒、张汤、儿宽、隽不疑、萧望之、龚胜等人每每临朝廷议、奏

疏陈事必定征引古今故实为决断依据。帝王诏令也莫不如是,即便高帝年少时不学无术,而践祚之后下诏求贤,亦称道周文王、齐桓公“皆待贤人而成名”<sup>[3]4</sup>之事张本。

刘汉政权稳固之后,面临的国家治理问题已与三代有了极大的不同,仅凭经义折衷是非有很大的局限性,而且也不免泥古、附会。因而,要处理这些问题就需建立“汉家法度”。武帝在诏策中多次表示了“五帝不相复礼,三代不同法,所繇殊路,而建德一也”<sup>[3]82</sup>的看法,政治上实行“外儒内法”“王霸杂用”的汉家制度。同时,也不再局限于“稽诸往古”,而认为“汉亦一家之事,典法不传,谓子孙何”<sup>[3]33</sup>。意欲探求开创盛世、超迈三代的途径、法门。在武帝之后,许多政治问题已有成例可循。整个汉代所面临的主要统治问题和社会矛盾,如藩国、外戚、礼制、吏治、税赋、匈奴等,在西汉前中期都已经涌现出来,并在文、景、武、宣朝得到了成功的处理,为西汉后期和东汉提供了可资沿用的案例。如,宣帝时呼韩邪内属故事,成为东汉处理南匈奴问题效仿的成例。从此,“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,自亦毋庸援古证今”<sup>[14]44</sup>,从而建立了汉廷的“一家之事”。因此,武帝朝开始,政论文中使用“汉家故事”多了。

#### (二) 掌通古今,应对给事

帝王决断需要博学之士,对相关官员提出了掌握古今故实的要求。汉承秦制,在官员体制中本就设有太常博士、太常掌故之职,以备君主对问,要求任职者具有“掌通古今”的学识和素养。到武帝时,为集权而设置中朝,顾问应对成了中朝官员的职责。中朝这群人由贤良文学之士,或身兼外朝职务的侍中、中常侍、散骑等官员组成。贤良文学如《汉书》所举:“其所尤幸者,东方朔、枚皋、严助、吾丘寿王、司马相如。”<sup>[13]2775</sup>这些人多是博通之士,如武帝曾使严助与大臣论辩,“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,大臣数黜”<sup>[13]2775</sup>。侍中、中常侍等职在西汉时还不是宦官专职,而是“参选士人”<sup>[5]285</sup>,是赐给列侯、将军、卿大夫、将、都尉等人员的加官,像后来王褒、刘向等人均以博学能文而得入中朝。由此,“掌通古今”以备顾问应对,由原本对博士、掌故这些专职官员的要求成为朝臣得入禁中的拔擢标准之一。

随着中朝权力的不断扩张,侍中、中常侍、等

加官演变成了实职,但是即便到了东汉侍中、中常侍“悉用宦者”<sup>[5]285</sup>，“赞导内众事,顾问应对给事”<sup>[15]3593</sup>依然是其主要职责,对任职者素养有极高要求。东汉皇室有意识提高宦官的整体知识水平,使其有能力履行职务。如和熹邓后“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,以教授宫人,左右习颂,朝夕济济”<sup>[15]424</sup>。像东汉曹节、徐璜、吕强、赵佑等宦官均有政论记载于《后汉书》中,如吕强《上疏陈事》罗列事类,引《易经》《穀梁》言阴阳灾异,长篇大论,体现出其对典故故实的熟知和良好政治素养。

皇帝“顾问应对”的需求无形中提高了对官员的知识素养要求。严助、东方朔、司马相如之流是武帝见其才而擢用,后世官员乃至宦官,为了能出入禁中、成为君主近臣,不得不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。政论文中故事材料增多,正是政论文作者学养知识日益提高的表现之一。

### (三)博学多通,经世致用

“掌通古今”的素养一方面是皇帝任用中朝官员的要求,另一方面则是学者士人群体自觉追求博学的体现。“博学一事,自西汉刘向父子及扬雄以来,已渐成风气。”<sup>[16]159</sup>这股博学之风的标志是知识的博通。《后汉书》中常以“通儒”来形容一些经师、儒生,如“(杜)林从竦受学,博洽多闻,时称通儒”<sup>[15]935</sup>“(贾逵)学者宗之,后世称为通儒”<sup>[15]1235</sup>“(马融)才高博洽。为世通儒”<sup>[15]1972</sup>等等。“通儒”区别于专治一经、固守师法、家法的章句之儒,以博学多通、经世致用为世人推崇。如刘歆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一方面表达了对章句鄙儒“因陋就寡,分文析字,烦言碎辞”<sup>[3]414</sup>的鄙薄;另一方面,表现了经世致用的态度,儒者通经不应是“信口说而背传记,是末师而非往古”,而应是为“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”之类的“国家大事”服务的。<sup>[3]414</sup>这种治学态度也被东汉“通儒”所承袭。如光武帝见杜林,“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,甚悦之”<sup>[15]936</sup>。杜林不但博通经书,而且对当时政治时局也颇为知晓。后来光武帝“大议郊祀制”,杜林又独排众议,以为“祖宗故事,宜所因循”<sup>[15]937</sup>,当祭祀后稷,得到光武帝认可。杜林因博通“祖宗故事”,能以之应对时务,受到光武帝赞赏。由此可见,通儒当如应劭所说:“儒者,区也,言其区别古今,居则玩圣哲之词,动则行典籍

之道,立当时之事,此通儒也。”<sup>[17]619</sup>像刘向父子、扬雄、桓谭、贾逵、马融、郑玄、杨震等人莫不如此。“通儒”现象的背后是“一种以博闻强记为特征的知识主义风气”<sup>[18]306</sup>。葛兆光认为,知识主义风气是借助注释经典的方式表现的,在诠释中刺激了历史、文字等知识的增长。<sup>[18]307</sup>历史、文字知识随着儒生、经师入仕而被应用到政务处理过程中,政论文中频繁地引经用典、罗列故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

### (四)历史文献,积累素材

政论文中使用的故事材料来源之一是史料。汉代人有意地保存和整理历史文献材料,为政论文使用故事材料积累素材。从汉初以来,汉朝君臣就注意史料、文书的存留,如刘邦入关,“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”<sup>[13]123</sup>,且保管于兰台、石室、金匱等专门场所,设有御史中丞、秘书监、校书郎等官员“掌管图籍秘书”。<sup>[13]725</sup>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,西汉时期有国史性质的书目有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、《太史公》、冯商所续《太史公》七篇、《汉记著》百九十篇、《汉大年纪》五篇、《高祖传》十三篇、《孝文传》十一篇。这些书目中,《太史公书》即《史记》,不必多言。《楚汉春秋》为汉初功臣簿,《汉记著》为西汉君主的《起居注》,这些书籍记载虽然简略,但无疑为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的编纂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《高祖传》《孝文传》所记录的君臣语录及诏策,则直接为后来君臣的政论文援引为成例。元始五年(5),汉平帝不及有遗诏而驾崩,元王后《出平帝媵妾诏》曰:“其出媵妾,皆归家得嫁,如孝文时故事”<sup>[3]102</sup>。“孝文时故事”即是指文帝后七年《遗诏》,其中最后一条为“归夫人以下至少使”<sup>[13]132</sup>,颜师古注引应劭曰:“夫人以下有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七子、长使、少使,皆遣归家,重绝人类”<sup>[13]134</sup>。可见元王后的诏书是参考了汉文帝《遗诏》的。在汉代政论文中,像这样援引前代诏令故事的例子还有很多。

冯商受诏续《太史公》表明西汉官方有修撰史书的自觉意识,到了东汉更是几乎每一朝都有一批学者著作东观,修撰国史。汉明帝时,班固一边编撰《汉书》,一边应诏“与前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共成《世祖本纪》”<sup>[15]1330</sup>。后来,班昭、马续又于东观藏书阁续《汉书》八表及《天文志》。永初年间,刘珍、刘驎

谿等人在班固《世祖本纪》基础上撰写《汉记》，永宁元年又受诏作建武以来名臣传。蔡邕、卢植、韩说等人补续《汉记》，荀爽作《汉语》，荀悦仿照《左传》作《汉纪》三十篇。为了方便阅读，又出现了学者对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删订的情况，杨终“受诏删《太史公书》”<sup>[15]1599</sup>，应奉“删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及《汉记》，名曰《汉事》”<sup>[15]1608</sup>。桓帝时，伏无忌、黄景、崔寔等人撰写《汉记》，“又自采集古今，删著事要，号曰《伏侯注》”<sup>[15]1898</sup>。西汉以来也特别重视对君主日常生活的记录，按“汉之旧典，世有注记”<sup>[15]426</sup>。明德马后自撰《显宗起居注》，安帝下诏为和熹邓后作《长乐宫注》《圣德颂》等就是历代君主日常生活的常规记录。

东汉世代修撰《汉记》、国史，使得历朝历史文献资料得以汇总保存，为政论文使用事类材料提供了素材。另外，一批又一批学者“著作东观”显示了他们对汉家礼制、法度、故事的熟悉。这些学者，如班固、马融、蔡邕、卢植等，不仅在民间学术领域具有巨大影响，而且在朝廷也是君主策问参谋的对象，他们对历史故实的熟悉体现在政

论文中，很容易引起长篇排比故事的风气。

汉代政论文故事化取向，将相似的事情联系在一起，为说理论证或政治实践提供依据，在本质上是出于古人的感性思维。王启才从思维发生学的角度指出：“这是一种表象思维，具有感性直观性，个别倾向突出，形象性较强，富于联想和幻想，带有较浓烈的感情，比喻和类比是其常用的方法。”<sup>[19]245</sup>因而，政论文中的章表奏疏等文体虽然是应用文，却往往写得文采飞扬，感情充沛。然而，就政论文说理来看，却没有仅仅停留在感性思维的层面上。汉人使用故事能够透过表象，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，体现出浓重的理性色彩，只不过多数文章并不能使用逻辑概念阐明而已。另外，章表奏疏使用故事不只为说理议论张本，也是一种有效的进言策略。汉代皇权高度集中，士人向帝王进言，文辞便不得不温柔敦厚、止乎礼义。这种情况下，为实现进言目的，以故事婉转其辞，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为实现政治抱负、改善社会状况的苦心孤诣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阮忠. 先唐文化与散文风格的嬗变[M]. 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9.
- [2]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3]严可均. 全汉文[M]. 任雪芳,审订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9.
- [4]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春秋公羊传注疏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- [5]严可均. 全后汉文[M]. 许振生,审订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9.
- [6]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春秋左传正义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- [7]刘勰. 文心雕龙[M]. 范文澜,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8.
- [8]吴毓江. 新编诸子集成墨子校注[M]. 孙启治,点校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3.
- [9]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礼记正义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- [10]陈望道. 修辞学发凡[M]. 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8.
- [11]王先慎. 新编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[M]. 钟哲,点校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8.
- [12]叶瑛. 文史通义校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13]班固. 汉书[M]. 颜师古,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14]赵翼. 廿二史札记[M]. 王树民,校证. 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
- [15]范晔. 后汉书[M]. 李贤,等,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16]牟润孙. 注史斋史稿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9.
- [17]应劭.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风俗通义校注[M]. 王利器,校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
- [18]葛兆光. 中国思想史[M]. 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1.
- [19]王启才. 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[M]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9.

(责任编辑:许 金)